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杭州
南京
武汉
苏州
成都

天津
青岛
重庆
宁波
长沙
无锡
香港
郑州
厦门

西安
济南
佛山
合肥
东莞
珠海
福州
昆明
南昌

沈阳
常州
大连
澳门
烟台
南通
泉州
太原
贵阳

石家庄
长春
唐山
南宁
徐州
哈尔滨
中山
海口
惠州

呼和浩特
乌鲁木齐
兰州
江门
保定
肇庆



机遇之城 2023



普华永道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积极推动城市经济复苏 和高质量稳步增长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火车头”，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过去五年，中国的城镇化取得瞩目成就，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017年的58.52%提升至2022年的65.22%，城镇化质量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已降至7%左右，绝大部分经济活动主要发生在城市。当前，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居民的生活消费、旅游消费意愿逐步回暖，城市经济活力在快速恢复，对带动经济复苏和稳健增长具有积极作用。

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新格局”。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通过发挥规模经济和集聚效应，已成为引领区域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2022年，中国经济规模最大的前50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超过50%，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城市群经济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约为40%。成渝、武汉、长株潭、中原等中西部城市群也在快速崛起，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经济版图重塑的重要推动力量。

今年是《机遇之城》报告发布的第十年，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与普华永道密切合作、共

同努力形成了这一系列性的城市观察成果，见证了中国城市逐步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报告成果也成为许多城市管理工作的参考。十年来，报告的城市观察选择从15个逐步扩展到今年的51个城市，涵盖中国主要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重要城市。报告的十个观察维度也随着中国城市的发展进程和发展目标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和调整，近年来增加对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注，如“城市韧性”、“新能源普及率”、“数字城市”、“城市环保”、“绿色低碳”等领域，报告始终坚持综合的观察和分析，发掘城市的比较优势和潜力，帮助城市实现追赶和超越，也希望能够对关注城市发展机遇的读者有所帮助。

借此机会，我想对普华永道团队多年来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表示感谢，期待双方团队能够保持密切合作，持续为城市的决策者和投资者提供前瞻性的观点和洞见，助力中国城市新的发展时期。

方晋

方晋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秘书长

唤醒城市活力 驱动城市变革



变化和不确定性是过去几年间全球的共同关键词。宏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劳动力紧缺等多重因素使得企业和个人所面临的环境充满挑战。未来数年，各种不确定性或将持续存在，在变革中谋求激发经济活力和可持续发展，重新唤醒城市活力，或许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机遇所在。

城市作为企业和居民生产、生活的空间载体，承载着大量消费需求，同时也是刺激生产的驱动力。全球企业非常重视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新的公共卫生政策也给企业带来了新的信心，中国拥有的消费者基础可以创造强劲的消费需求，并在科技创新和应用方面做到全球领先。激发城市的消费活力，提振居民对消费经济的信心和需求，恢复服务经济的增长动力，是非常有利于经济恢复的有效举措，也给市场带来更多开放合作的新机遇。

从中长期的持续稳定发展诉求来看，数字化、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将是驱动城市变革的几个重要议题。通过数字化变革使得产业得以转型升级，使得城市生产、生活环境实现数字化赋能，总体来看，数字化经济是极具发展潜力的新机遇。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城市将是未来城市的主要形态，从供应链、企业生产到居民消费、生活，绿色理念和低碳举措将逐渐辐射影响到方方面面，人

们的关注和重视程度也在逐步提升，技术创新和技术推广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多种发展机遇。可以说，多维度、多元化的创新推动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也是未来我们最为关注并将持续进行深入观察分析的城市发展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是普华永道团队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合作开展《机遇之城》的第十年，回顾这十年以来中国城市的飞跃发展和巨大变迁，我们非常荣幸能有机会深入观察和见证这一历史性的发展阶段，希望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管理者和投资者有所助益。十年来我们与基金会团队保持着良好的紧密合作，在此也要向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表示诚挚的感谢。未来双方团队将继续关注和研究中国城市的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为各方提供不同视角的城市洞察分析。

罗浩智
普华永道 全球主席

目录

概述	04
城市选择	04
调研方法	05
观察结果	05
关于访谈	06
十年·回顾	07
机遇之城2023维度排名及分析	11
一、智力资本	13
(访谈) 杨伟民：城市政府推动经济好转的三个着力点	15
二、技术与创新	17
(访谈) 郑磊：推动高校与城市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	19
三、区域重要城市	21
四、城市韧性	23
(访谈) 鲁元平：韧性城市建设的推进路径	25
五、交通和城市规划	27
六、可持续发展	29
(访谈) 沈和：突出抓好中国式城镇现代化“三个重点”	31
七、文化与生活	33
(访谈) 李晓江：城镇化/城市视角的服务与消费经济思考	35
八、经济影响力	37
九、成本	39
十、宜商环境	41
变量说明	43
鸣谢	53
进一步联络信息	54

概述

城市的发展变迁承载了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诸多印记，每个历史阶段的发展成就和经验积累指引着我们寻找新的发展周期所蕴含的发展机遇。时间迈入2023年，尽管外部环境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但是寻求稳健的发展机遇、发掘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潜力，是当前中国城市的关注重点。长远来看，中国城市在完成城镇化的初步目标之后，进入一个全新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发挥领先城市在区域城市群中的带动、示范作用，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均衡、协调发展，鼓励城市的绿色低碳发展、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将是新的发展周期中的重点关注方向。

自2014年至2022年，普华永道中国与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已共同发布了九期《机遇之城》报告。这份报告是观察中国城市发展历程和机遇的系列研究，从全球城市的观察视角并结合中国城市的发展特色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性的多角度观察。今年第十期的报告在保持往期城市观察内容的基础上，对这十年来的城市观察结果也进行了梳理回顾。

城市选择

随着中国新兴城市的不断崛起，许多城市呈现出具有吸引力的发展机遇，今年我们对中国城市的观察范围扩大到51座城市，力求在地理区位和综合发展水平角度上覆盖更多的城市。

从区域上来说，51座城市覆盖了中国多个主要城市群的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如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等。从发展程度上来说，《机遇之城》报告的观察角度一直试图在城市体量和城市发展水平上取得一定的平衡，观察城市的独特发展脉络和维度优势，寻找潜在机遇，是《机遇之城》报告一直以来的坚持。

《机遇之城2023》的51座城市分别是（大致按由北到南、由西到东排列）：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乌鲁木齐、兰州、西安、呼和浩特、太原、北京、天津、石家庄、唐山、保定、济南、青岛、烟台、郑州、南京、武汉、徐州、常州、南通、无锡、苏州、上海、杭州、宁波、合肥、福州、泉州、厦门、长沙、南昌、广州、深圳、肇庆、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珠海、成都、重庆、昆明、贵阳、南宁、海口，以及香港和澳门。新增城市为烟台、徐州、南通、泉州。

调研方法

《机遇之城》的调研方法采用普华永道城市评估工具对选定的城市进行观察。这个评估工具包括十个观察维度，涵盖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城市基础设施、自然环境、人口、城市治理及城市影响力等多个层面。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的观察体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更希望跟随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脚步能够与时俱进的反映城市的发展成就和潜在机遇，因此在十个观察维度下在通过丰富的变量进行细化观察，并在保持基础原则和体系不变的前提下，适度跟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整。当然，现实社会和城市形态都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积淀、人文风貌、着眼未来发展的战略和智慧等等都是无法用数据模型简单衡量的，也受到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的限制，我们更多的是希望通过这一工具为观察城市提供更为丰富的视野和多元化的观察角度。城市的观察结果排序不具备与往年比较的基础，本期报告的结果是一个相对独立的观察。

本期报告共设十个观察维度，每个观察维度下设5个变量共计50个变量。部分变量下设子指标，主要是考虑到每个维度下各类型变量的数量均衡，同时单个变量下的数据指标能够贴切反映该变量的发展水平。变量及子指标同时衡量人均数据及总量数据，综合考量城市的发展基础和潜在机遇，在同口径比较所有城市的同时，亦考量规模体量带给城市的发展优势。鉴于部分数据统计口径变化和城市观察角度的改进，本期报告相较上一年在“可持续发展”维度使用“绿色低碳”变量替代了“劳动力”变量，在“文化与生活”维度使用“博物馆”替代了“文化产业从业人员”变量。所有的变量设计角度和数据来源均在本报告的“变量说明”中有详细阐述。

普华永道评估工具的数据取值采用位序计分的方法，变量、维度均不设权重，每一座城市在变量中的位序构成积分，每一个位序积一分，对应位序的分值按降序排列，即在51座城市中排第一位的积最高分51分，排末位的积最低分1分，并列排名的积分相同。但个别维度，例如成本，则按对应位序的升序排列，即积分等同于位序。按位序计分，使得城市之间复杂的绝对值差别简化为等距为1的分值。每一个维度中各城市不同变量的积分之和，构成在维度中的排名；所有维度下所有变量的积分总和构成所观察城市的总排名。

数据来源以客观、公正、严谨、适用为原则，主要源自公开渠道，包括国家统计局数据、政府部门统计数据及信息公开、各城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权威智库、大学、研究机构的调研数据或大数据调研结果，统计数据时点为2021年，部分调研数据时点为2022年，数据采集时点截止至2023年2月。个别城市数据披露不足的，结合省级数据或同口径数据辅助计算。

观察结果

《机遇之城2023》观察结果排在前四位的是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这四个城市。其后十位依次是：杭州、南京、武汉、苏州、成都、天津、青岛、重庆、宁波、长沙。随后是：无锡、香港、郑州、厦门、西安、济南、佛山、合肥、东莞、珠海。再次是：福州、昆明、南昌、沈阳、常州、大连、澳门、烟台、南通、泉州。最后为：太原、贵阳、石家庄、长春、唐山、南宁、徐州、哈尔滨、中山、海口、惠州、呼和浩特、乌鲁木齐、兰州、江门、保定、肇庆。

从观察结果来看，城市的总体表现依然依托于其发展积累和各维度综合表现。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继续保持在中国城市中的领先优势，杭州、南京、武汉、苏州、成都、天津紧随其后进入前十名。杭州和南京在均衡发展优势方面表现突出，分别有7个和8个维度表现进入前十。武汉保持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在“智力资本”等多个维度位列前十。苏州在“技术与创新”、“交通和城市规划”、“文化与生活”和“宜商环境”均进入前五，反映出城市“宜居宜业”的发展优势，成都和重庆在“区域重要城市”进入前五，“经济影响力”均位于十名左右，体现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发展水平在快速提升。天津在多个维度表现与总排名位次相当，发展态势均衡稳健。篇幅有限，我们仅就总排名靠前的城市做简要点评，具体维度排名和分析可参见内文以获得进一步的了解。

总体来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目前最具领先优势的三大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发展带动作用在未来一定时期内仍是关键的驱动力。同时，中心城市的引领、示范作用对于其它区域中心城市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欣喜的是，长江中游经济带、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区域也在中心城市的带动下快速崛起。这些区域经济的振兴和稳健发展，对于整体中国经济的稳定向好发展是重要的支撑力。

□ 关于访谈

《机遇之城2023》有幸邀请到了以下专家分享他们在相关领域的观点和见解。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杨伟民先生，对城市政府推动城市经济好转提出了《城市政府推动经济好转的三个着力点》。

合肥工业大学校长郑磊先生，结合高校实践经验，分享了《推动高校与城市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真知灼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鲁元平先生，针对韧性城市建设的多方路径提出相关观点和见解，分享了《韧性城市建设的推进路径》。

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会长、中资智库首席专家、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原副主任沈和先生，结合国际城市群发展规律，建议《突出抓好中国式城镇现代化“三个重点”》。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李晓江先生从城市消费经济角度分享了《城镇化/城市视角的服务与消费经济思考》。

我们的报告是社会责任式的，访谈人以同样的角度参与。在中国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城市经济、智力资本与创新等领域，通过他们的洞察和分享，为我们的报告扩展了视野、增添了多元化观点和思考的深度。



十年·回顾

观史而知今，此次十年回顾是对《机遇之城》观察系列的一个概要性回顾，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去阶段性总结我们的观察结果和从时间线角度再次观察城市的发展变迁。由于《机遇之城》的观察城市范围和指标框架在十年间是动态变化的，北京、上海、香港、澳门自2019年加入综合排名，因此我们将这4座城市与深圳、广州共6城一起进行五年回顾分析，其它城市进行十年回顾分析。回顾分析重点关注在维度层面的领先城市，主要观察城市发展实力和特点的持续性变化，相信这些城市的特色优势维度也是其长久的发展机遇所在。



回顾·“北上深广港澳”主要发现

“北上深广港澳”六城在过去五年的观察中经常位居多个维度的前列，是中国城市中实力很强、国际化程度很高的领先城市。因此我们将六城在过去五年报告中排名维度第一的城市列举出来，可以发现在指标体系中具体变量随年份动态变化的情况下，“技术与创新”、“区域重要城市”、“城市韧性”、“文化与生活”存在领先优势非常明显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上海、香港和北京。在“智力资本”维度，北京与广州均呈现一定的相对优势，在“经济影响力”维度，北京与香港呈现相对优势，在“宜商环境”维度深圳近年来优势较明显，香港、上海也呈现一定优势水平。这个回顾发现与我们普遍印象中对这几个城市的定位印象似乎也比较契合，实际而言，这六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好，各项发展都是较为均衡的，在上述维度上未能位居第一的城市也基本在维度前五，在单个维度上的领先优势更多凸显了城市的优势领域，也是其独特的发展特色和机遇所在。



当然，全球所有超大型城市、发达城市所面临的“交通与城市规划”和“成本”难题也是这几个城市一样面临的挑战。对于建成区面积较大、绿化覆盖率较好的大城市而言，通过有效规划道路及多元化通行方式，仍可提升城市运转效率，在一定程度上仍能够呈现优势，但是对于常住人口较多，建成区面积相对较小的大城市而言，挑战将持续

存在。同样的还有来自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挑战，常住人口集聚的大型城市如何解决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绿色低碳理念和高效集约化发展是当前的答案。不过，挑战与机遇总是共存的，通过新能源方案、数字化转型手段等新型生产力来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长久动力，是这些城市正在引领的新型发展机遇。

2019-2023年维度排名第一的城市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智力资本	北京	北京 广州	广州	北京	广州
技术与创新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深圳
区域重要城市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城市韧性	香港	香港	香港	香港	上海 香港
交通与城市规划	-	深圳	北京	-	-
可持续发展	-	深圳	-	-	-
文化与生活	澳门	上海	上海	上海	上海
经济影响力	北京	北京	香港	香港	香港
成本	-	-	-	-	-
宜商环境	香港	深圳	上海	深圳	深圳



1. 智力资本

“智力资本”维度综合观察城市的智力资本储备能力和科技研发支撑能力，共包含五个变量：“高等教育规模”与“文化程度”变量分别衡量了城市的人才储备规模和人口文化水平；“企业R&D经费”、“国家重点实验室”、“科技支出”变量分别评价了企业科研竞争力以及城市基础研究水平积累和科技资源投入程度。

广州、北京、武汉、上海和南京位列本维度排名前五位。区域中心城市杭州、长沙、西安、深圳、天津、郑州、成都、重庆、合肥、青岛依次位列第6至15名，这些城市不仅具备扎实的基础科研能力，同时在科研成果向产业转化领域投入也较多，其中多个城市在五个变量中均有较高积分，呈现出综合、全面的智力资本实力。

长三角城市群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在“企业R&D经费”和“科技支出”变量中均表现亮眼。长三角城市苏州、上海、无锡、杭州、宁波、常州，以及首次纳入观察的南通均位于“企业R&D经费”变量积分前列，积极推进科研资源与企业深度协同合作的模式，高质量培育科技创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澳门、深圳、珠海、广州、佛山均位列“科技支出”变量前15名，强劲的区域经济实力能够有效反哺和支撑研发投入，“十四五”阶段，广东省将继续全面加强基础研究投入，加快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进一步凸显科技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中西部城市在“高等教育规模”、“国家重点实验室”变量有较好表现，得益于历史积累和国家政策长期投入，良好的人才基础对于带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长期战略意义。传统教育资源强市郑州、武汉、重庆、成都、西安在“高等教育规模”变量排名领先，哈尔滨、昆明、长沙凭借其较高的高等学校在校生数量亦跻身前十。其中，长沙积极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充分发挥在长四大名校的资源优势，辐射带动周边城市，服务强省会战略和长株潭一体化发展。“国家重点实验室”变量中，西安在网络通讯、人工智能、光子与微电子等前沿领域培育力度较大，着力推进了西北大学和西安科技大学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筹建落地。同为西部城市的兰州在此变量排名第15，优于维度排名，其主要聚焦能源科学、生态环境、文化遗产保护等具有甘肃特色的优势领域。

“文化程度”变量从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比和文盲率两个子指标衡量城市的高素质人才资源和教育普及程度，北京、深圳、西安、太原位列前四名。人才是推动实现东北产业升级转型、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作为东北地区重要城市，沈阳、大连、长春排在第5、14、16名，优于维度排名。沈阳坚持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义务教育优质资源覆盖率达到100%，获批东北首个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国家实验区。

访谈

城市政府推动经济好转的三个着力点



杨伟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

城市经济是全国经济的主体，城市经济好转了，全国经济才能整体好转。今年，城市政府着力抓好以下三个影响经济好转的关键点。

一、着力扩大城市居民消费

疫情三年来，需求端受影响最大的是居民消费。目前的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城市是不是坚持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了在经济发展基础上改善民生，最终的实践标准是看城市居民的消费是不是增长了。城市政府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摆在扩大投资之前。改变长期以来扩大内需就是扩大投资的思维定势。提高城市居民收入，实行给居民让利、给居民减税降费和加大转移支付的政策，改变在住房、汽车以及部分服务领域的消费抑制政策。

二、促进房地产业稳定

最近十几年，很多城市逐渐形成了以房价上涨为龙头，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城投平台）三个主体相互促进、相互支撑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格局。目前，随着全国人口总量达峰，特别是跨区域的大流动，加上房价上涨动力减弱，房地产企业、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风险敞口增多，以及多年的行政性调控和严监管等，房地产出现行业性衰退。房地产在不少城市的经济总量中占有较大比重。房地产在人口流入的城市还不是夕阳产业，无论是租赁住房，还是购置住房仍有刚需。稳步扩大居民住宅的供应量，仍是人口流入城市的重要任务。城市政府短期要重点做好保交楼工作，同时，要瞄准党的二十大确定的新的住房制度和新的房地产发展模式，继续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特别要解决好新市民、青年人等的住房问题，并在房地产相关的土地、金融、公积金、预售、租赁、租售同权等制度方面积极稳妥推进改革。

三、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民营经济是城市经济的主体，在推动城市发展、促进创新、提供税收、扩大出口、创造就业、实现共富、繁荣城市等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民营经济发展预期减弱，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增长放缓。党的二十大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城市政府要落实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助力扭转民营经济预期。依法引导社会舆论，对不正确议论，毫不含糊地亮明态度。依法保护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确保各类市场主体的产权都神圣不可侵犯。废除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文件和特殊监管，破除隐性壁垒。完善政商沟通机制，制定政策要坚持听取企业家意见，应事先征求民营企业家意见。建立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完善公职人员问责追责机制。



2. 技术与创新

高新技术的变革与进步为城市产业结构优化催生出更多机遇，是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的有效支撑。“技术与创新”维度着重考察城市技术发展的成熟度与数字化领域的技术创新水平，包含5个变量，分别是“专利授权”、“高新技术企业”、“新能源汽车普及率”、“移动互联”、“数字城市”。

在维度排名前十位中，长三角城市上海、杭州、苏州、南京、无锡占据5席，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深圳、广州、东莞占据3席，京津冀城市北京、天津占据2席，体现出城市技术发展的区域聚集化效应。

“专利授权”变量中深圳、苏州分别位列前二，珠海、无锡、常州紧随其后，表现优于维度排名。珠海现已搭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公共服务运营平台，以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全链条，赋能城市支柱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以科技服务功能在大湾区城市的科技创新发展领域形成自己的独特城市定位。

苏州、杭州、天津、武汉、成都、南京、东莞等城市在“高新技术企业”变量表现不俗。武汉实施高技术企业培育行动计划以来，光电子信息、汽车及零部件、生物医药等万亿产业集群蓬勃发展，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产业强势崛起。成都在近年来出台了多项科技成果转化举措，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快速增长。

新能源汽车汇集新能源、新材料和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多种变革性技术，是衡量城市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除财政部出台购置税减免政策外，各地政府也相继发布绿色消费刺激政策，以进一步提振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新能源汽车普及率”变量中，海口、厦门、太原、合肥表现亮眼，分别位列第2、8、11、15名。海口积极推进世界新能源汽车体验中心建设，通过举办高级别展览活动打造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前沿高地，加快形成高端智能制造产业集群。合肥则是锚定“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建设目标，现已集聚包括比亚迪、蔚来、大众（安徽）等6家整车制造企业，及国轩高科、中创新航、巨一科技等关键配套企业，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呈现强劲发展势头。

数字化转型是当今城市探索和实践的前沿方向。“移动互联”变量重点观察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和应用。郑州、中山、昆明、太原、西安在此变量的表现优于维度排名。“数字城市”变量中，互联网产业发展先驱城市依托其雄厚的数字化基础和竞争优势，在城市治理数字化应用和数字经济领域快速发展，深圳、广州、上海、杭州、南京、北京位列前茅。东莞在这一变量排名第7，表现可圈可点，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化技术构建全智能的城市生命系统，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落地，激活扁平化管理效能，推力城市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访谈

推动高校与城市融合创新高质量发展



郑磊

合肥工业大学校长

近年来，合肥坚持下好创新“先手棋”，奋力在高质量发展中闯出新路，从一座默默无闻的城市，一跃成为各方追捧的明星。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合肥的先进制造业尤其亮眼，以建设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3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为牵引，推动“芯屏汽合”“集终生智”新兴产业成为现象级产业地标。

高校作为人才第一资源、科技第一生产力、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合肥快速发展过程中，合肥工业大学充分利用自身学科布局与其产业结构高度契合优势，在推进城校融合、产教融合、育引融合等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学校每年有约2800人留肥就业，其中70%以上主要服务于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电力行业和科技服务业等，一大批校友成为阳光电源、江淮汽车、蔚来汽车、京东方、长鑫存储等地标企业中的骨干和中坚力量。学校“十三五”以来累计授权发明专利5077项，先后服务安徽企事业单位2500余家（次），合作项目超4000余项，其中近七成在合肥。学校建构“工大智谷—合工大智能院—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三级贯通的企业孵化成长体系，联合共建各类科技创新平台41个，累计培育、孵化企业140余家（其中27家企业获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5家在安徽省股权交易中心科创板挂牌），成为合肥市科技企业的主要策源地。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高校的教育、科技和人才资源，高校的发展也需要城市的资金、土地、产业和政策支持。两者之间关系密切，是融合共生的发展共同体。一所大学与一座城市有着同样的梦想，就会形成双向赋能、相互成全的发展新格局。因此，一个城市的发展品质和发展内涵，需要高校的智力支持；而高校支撑能力的发挥，需要城市的全方位支持，二者才能相得益彰。面向未来，合肥工业大学将紧紧围绕国家重要战略需求，综合学科结构优势，聚焦集成电路、新型显示、人工智能、新能源暨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制造、绿色食品、生命健康、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全面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为“芯屏汽合”“集终生智”集聚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

一是强化有组织的科研，提升科研创新能力，助力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要加强一流学科建设，以具有学科前瞻性和技术创新性的重大项目为依托，加强高水平学科基地建设；推进科研平台建设，加快推进基础科学中心建设，做好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基地平台的筹建工作，加强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能源研究院等平台建设；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探索城校共生、产教城融合发展新模式，建设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产业孵化”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深化科研体制改革，建立以学术质量为导向的资源配置机制实施以中长期目标为导向的考核评价机制。

二是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加强急需人才培养，助力打造新兴产业聚集地。要加大紧缺本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建立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联动机制；提升高端人才培养水平，完善科教融合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制度改革；加强优势特色学科建设，调整、撤并、整合部分学科，制定重点支持的学科专业清单，推动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做实做强一批新的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同时，探索推进育引融合，依托国家高层次人才项目和地方人才政策，加快培养和引育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的一流拔尖人才、领军人物和创新团队。

三是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服务全面绿色转型，助力打造美丽中国样板区。遵循党的二十大“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战略要求，坚持系统观念，顶层谋划绿色教育，构建绿色学科体系，完善绿色课程体系，打造绿色教育教学体系，倡导绿色低碳生活，加强复合型绿色专门人才培养；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节约利用、节能降耗、污染治理以及绿色产品等重点领域，实施基础研究突破行动，组织绿色关键技术攻关，加强绿色创新领军人才、拔尖人才引育，充分发挥学校绿色科技的基础研究主力军和重大科技创新策源地作用，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提供人才与科技支撑。

总之，高校是一个城市文化最先进的聚集地，也是一个城市文明的重要展示窗口，更是一个城市发展智力支撑的重要源泉。振兴高校教育，以其自身的文化、教育、科技优势推动城市文化、经济、科技创新发展，进而提升城市的繁荣发展，从而提高城市的发展内涵和居民的文明素质，高校的作用不可忽视。

3. 区域重要城市

城市群和中心城市作为带动全国发展的动力源，引擎作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十四五”时期，如何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疏密有致、分工协作、功能完善的区域空间结构，仍然是新型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区域重要城市”维度借助“星级酒店”、“飞机起降航班”、“客运总量”、“货运总量”及“会展经济”共5个变量综合考察城市在旅游、交通、物流等领域所发挥的地理性和经济性枢纽功能。

上海、广州、北京、深圳在本维度排名前列。重庆、成都均跻身前五，展现出成渝双城经济圈乘势而上的发展实力。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这三个主要城市群保持了一贯的领先优势。此外，武汉、西安、济南和青岛也持续发力，其所处的长江中游城市群、关中平原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是推动东中西部地区均衡发展的重要区域，中心城市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尤为关键。

西南地区门户城市在各个变量中也体现了较强的区位优势，为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成渝城市群地处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起点，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撑。重庆在“星级酒店”和“货运总量”变量积分领先，是西部地区经济贸易往来与物流运输的开放高地；成都在“客运总量”和“会展经济”变量优势明

显，具有较强的文化创新发展活力和国际影响力。二者作为中心城市统筹发展，优势互补，促进要素流动和高效集聚，形成了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

贵阳作为黔中城市群的代表，在“客运总量”和“货运总量”变量中继续保持领先，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沪昆通道和粤港澳—成渝主轴三条国家交通主骨架，推动形成了三条城镇发展带，彰显出较大的发展张力。“飞机起降航班”变量中，昆明、长沙、郑州、乌鲁木齐等中西部区域中心城市表现均优于维度排名，在航空运输领域体现出较为明显的极点作用，同时也增强了各个城市间的粘性。

东部地区在强化区域中心城市资源和产业优势的同时，着力完善城市群与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机制。江苏省建立南京、苏锡常、徐州三大都市圈，放大重要城市的影响力，形成多中心、多层次、多节点的网络型城市群结构。南京在各个变量中表现均衡；苏州在“星级酒店”和“客运总量”也表现较好；今年首次纳入观察的徐州在“货运总量”中表现亮眼，位列第8。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徐州致力于成为策应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多式联运门户枢纽。总体来看，都市圈辐射带动力是区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的主力军，也是增强各个城市群协同发展的粘合剂。





4. 城市韧性

随着城市群对人口、经济的集聚能力日益增强，自然与社会风险也随之出现高耦合性与级联性。建设韧性城市是城市通过自身能力应对风险、抵御灾害、减缓损失并从冲击中快速恢复的必然需求。在“城市韧性”这一维度中，我们通过“医疗资源”、“卫生健康”、“养老保险”、“公共安全”、“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五个变量评价城市运行管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和政府投入水平。

当城市面临疫情等特殊阶段，大型城市虽因其枢纽地位易受到较重的疫情冲击，但坚实的经济基础与高效的城市管理服务能力进一步强化了中心城市的比较优势。上海、香港并列维度第一，北京、深圳、杭州、天津、澳门、广州、青岛、南京依次位列第3名至第10名，重庆紧随其后，厦门和宁波并列第12名。厦门在卫生健康、公
共安全、应急管理等方面加大财政投入，着力健全卫生服务体系，加强安全韧性城市建设，筑牢城市生命线，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宁波地区生产总值保持增速稳定且增量可观，体现出较强的经济韧性，同时加大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等领域的政府投入和资源配置，健全风险识别和闭环管控机制，提升城市的韧性水平。

“医疗资源”变量采用三甲医院总数、执业医师总数及每万人执业医师数、医院床位总数及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作为子指标，衡量城市的医护资源及医疗设施水平。排名前五的城市依次为成都、北京、杭州、郑州、济南。成都优质医疗资源快速增长，逐步构建全国一流的医院集群，扩大县域医疗共同体覆盖面，促进成都平原区域一体化发展。济南发挥强省会作用，

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推动高水平医院到新城区建设分院或整体迁建，提升区域辐射带动能力，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均衡布局。

“卫生健康”、“公共安全”、“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衡量城市在维持公共卫生、安全生产等日常工作运行，保障疫情防控等应急管理行动及时开展的资金投入情况。得益于其较强的经济基础和政府财政收入能力，澳门包揽“卫生健康”、“公共安全”两项排名第一，“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紧随天津位列第二，特区政府鉴于新冠疫情的反复冲击，推出多项公共财政资源援助措施，以纾缓民生困难和经济压力。新增观察城市南通在“卫生健康”、“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变量中表现优于维度排名，分别为列第10、14名，不仅深入推进健康南通目标，硬件提档与软件省级同步，而且积极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优化河网布局，稳步实现高水平韧性城市建设。

“养老保险”变量借助养老保险覆盖率考察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水平，北京、香港、济南、重庆位居前四，唐山致力于全面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政策的协同效应，老年人基本生活保障水平持续提高，变量排名第五名。青岛、成都、长沙、以及首次纳入观察的烟台在此变量表现出色，均高于其维度排名。

随着城市建设逐渐集聚化，社会各个系统紧密相连，灾害链和受灾范围都有所延展，因此提升城市韧性是应对复杂不确定因素的关键战略决策。



访谈

韧性城市建设的推进路径



鲁元平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设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韧性城市，核心就是城市发展要有效应对各种变化或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全球风险已进入多发频发期，如何促使一座城市能够凭自身的能力抵御灾害冲击、减轻灾害损失，并合理的调配资源以从灾害中快速恢复过来，仍是各个城市的长官需要下大力气探索实践的。

加强韧性城市顶层设计提升城市本质安全。本质安全是通过设计使生产设备或系统本身具有安全性，即使在误操作或发生故障的情况下也不会造成事故的功能。在建设现代化超大城市过程中，要追求的目标是通过全周期管理模式、优化城市产业模式、源头危机治理、多主体共同参与以及完备的治理体系，统筹城市安全与韧性发展的诸多物理空间要素，使各种风险因素及其所可能产生的危害处于受控制状态，进而趋于恒久型、韧性化的安全目标。

强化城市不同系统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兼容性。在进行海绵城市规划时，需要与水系生态修复、老旧小区改造、产业转移优化等问题等规划衔接整合。在基础设施与城市建设的土地规划中，未来的城市建设要考虑到生态环境涵养、土地规划与“留白”的长远价值，如严格禁止湿地、草地、林地破坏、探索开放空间的多功能用途等。探索区域“留白”的奖惩与协调机制，可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韧性指数等排名等相挂钩，激励以韧性理念推动区域发展。

构建多部门协调机制以充分激发治理效能。成立由应急管理、公安、民政、卫健委、水务等多部门联合组成的城市安全管理委员会，由行政主官担任一把手。主要负责统筹应对重大突发灾害事件，在更大的权限范围内整合资源并调动工作积极性，有效解决部门之间协调不足、互相推诿、管理碎片化的问题。扎实推进定应急管理部门“三定”方案的调整与完善，进一步规范应急管理部门的职能范围，遵循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等原则，建立运转有效的应急管理体制。

优化城市数字资源聚合共享和综合运用能力。大力推进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数字基础设施同步规划、设计和推进，构建以“城市大脑”为核心的新型智慧基础设施格局。建立健全城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体系，以需求为导向，依法推进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让数据在流动中发挥价值。通过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信息共享和信息共护的有机协调，保持城市系统正常运行和保护民生服务信息系统安全营造城市网络安全保障生态环境。积极调动社会公众参与网络安全治理积极性，逐步形成全社会网络安全协同体制，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和提升城市数字治理能力。

推动社区基层治理体系改革和治理效能提升。现有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无法满足群众日益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更难以应对一些突发事件。积极探索成立“社会治理委员会”，将社区由“行政末梢”转变为“治理枢纽”。牵头建立资源统筹协调机制，推进街道的体制改革，坚持法定事项部门负责，综合性、协调性、改革性事项统一集中，解决城乡社区发展治理职责分散、多头管理的问题。基于“平战结合”思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居民委员会”为主体，物业公司和志愿者服务组织为辅助的立体化多元社区防控体系。





5. 交通和城市规划

现代化高质量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纽带和支撑，“十四五”时期，城市交通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形势，区域经济布局、生态环境保护格局、人口结构分布、要素供给方式等发生变化，对城市公共交通体系和城市发展规划提出新的需求。“交通和城市规划”维度由五个变量组成，“道路资源”、“公交出行”、“轨道交通”、“交通效率”从道路基础资源、交通承载能力、拥堵情况与通行效率等方面描述城市的交通现状，“绿化”主要是指城市建成区的绿化覆盖率，反映城市资源禀赋和建设规划的情况。

厦门、南京、佛山、苏州依次位居维度排名前四位，武汉和宁波并列第五名，青岛和大连并列第七名，北京、无锡分列其后。南京在此维度连续名列前茅，高标准推动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及规划管理，入选国家“十四五”重点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武汉在2021年新增通车3条地铁线路，轨道交通运输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长三角城市群在此维度整体表现突出，秉承“协同建设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的目标，构建以上海、杭州、宁波、合肥、苏州、无锡等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多层次轨道交通体系，完善区域内部都市圈高效通勤网络。苏州在“道路资源”变量位居第一，积极推进全市跨区域路网建设、打通市域板块间的断头道路，最大能力保障公众出行需求。此外，长三角城市南京、无锡、常州也跻身前十。

在“双碳”目标下，城市群和都市圈交通体系规划建设应融入绿色低碳理念，打造以公共交通为主的城市绿色出行体系。“公交出行”变量中，澳门、香港、兰州、乌鲁木齐、珠海、北京、广州等城市表现亮眼，排名高于维度排名。乌鲁木齐高质量实施城市更新，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超九成，以建设“绿色交通城市”为目标，持续提升公交服务水平。

“轨道交通”变量排名前十依次为上海、北京、成都、武汉、南京、宁波、大连、苏州、深圳、杭州，包含八座超大特大城市。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大和汽车保有量的上升，大城市道路资源逐渐饱和，交通拥堵问题日益严重。超大特大城市着力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快速公交网络，将重点都市圈中心城区轨道交通适当向周边延伸贯通，改善城市交通运行效率并提高公众出行体验。相比之下，大中型城市在综合立体交通体系具有更多的拓展空间和优势，肇庆、常州在“交通效率”变量排名中分列前两名，南昌、南通、呼和浩特并列第三名，泉州、保定、南宁、郑州、唐山依次排在第6至第10名，表现均优于维度排名。

“绿化”变量借助建成区绿化覆盖率描述城市的绿地系统规划情况。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在前十名中包揽四席，结合各个城市特性加大留白增绿力度，科学优化城市生态空间，同步推进绿化工程和主体工程建设，为绿美粤港澳大湾区筑牢生态屏障。北方城市北京、大连、太原在这一变量也表现突出，分别位列第1、6、10位。



6. 可持续发展

随着全球人口的增长，应对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紧缺等问题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迫切任务。“十四五”期间，总体规划强调践行“双碳”目标，加快推动经济社会向绿色低碳转型。因此，今年“可持续发展”维度在通过“水资源”、“城市环保”、“空气质量”的角度考察城市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情况，通过“人口流动”的角度考察城市的人口变动情况的基础上，采用“绿色低碳”变量来衡量城市单位能源产出效率及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趋势。

海口在维度排名中拔得头筹，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获评全国黑臭水体治理示范城市，实现生活垃圾零填埋，空气质量持续领跑全国。福州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并于去年成功举办金砖国家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各项变量表现均衡，位列第二。排名紧随其后的均为东南地区沿海城市：广州、惠州、深圳、南宁、珠海、佛山依次位列第3至8名，北京排名第9名，重庆、厦门并列第10名。

重庆、哈尔滨、杭州、宁波、肇庆得益于沿江城市的天然优势与较为完善的水资源管控保护体系，依次位列“水资源”变量前五位。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产业转型升级的加快，高端制造业、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迅速崛起，深圳、东莞、中山、珠海、广州、佛山吸纳了大量流动人口，在“人口流动”变量中位列前十，为城市的劳动力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支撑。

“城市环保”包含垃圾焚烧率和污水处理率两个子指标，保定深入推进绿色低碳提升工程，强化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及污水处理工程建设，位列第一。珠海、太原紧随其后，无锡、石家庄、沈阳、青岛、泉州、济南等城市在这一变量也表现不俗，远优于维度排名。贵阳近年来全力筑牢生态屏障，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在空气质量综合指数和空气质量优化程度两个子指标上彰显优势，位列“空气质量”变量第一位。呼和浩特在两项变量排名中均位列前十，深入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基本消除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气，创建成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

“绿色低碳”是今年新增变量，在“双碳”目标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城市实现碳减排的核心途径之一。区域中心城市的产业结构特征一定程度地反映在能源产出效率上，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将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低耗产业的兴起。因此我们引入单位用电支撑的地区生产总值和城市绿色低碳水平排名作为子指标，综合观察城市建设的能耗水平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水平。北京、深圳、广州、成都、武汉等城市表现优异，以第三产业为主要支撑产业的中心城市能够在单位能耗下获得较高的经济产出，体现出发达城市能源利用的高效性以及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进展。

访谈

突出抓好中国式城镇现代化“三个重点”



沈和

江苏省城市经济学会
会长、中资智库首席
专家、江苏省政府研
究室原副主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贯彻落实好这一战略部署，必须突出抓好“三个重点”。

一是遵循发展规律，把城市群建设作为主攻方向。城市群是城镇化的高级形态和主导力量。当年欧洲率先实现现代化，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和以巴黎为中心的西北欧城市群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战后，美国现代化后来居上，以纽约为中心的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时代以来，中国布局长江经济带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重大战略，就是要打造包括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等一批世界级城市群，从而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要因势利导，科学规划，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主攻方向，以特大城市和中心城市为重要依托，以促进跨区域要素合理流动为抓手，着力完善以新基建为支撑的重大基础设施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提升城镇化现代化建设整体水平。

把握时代特征，把新型城镇化作为重中之重。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全球工业化进入4.0时代，其核心是智能制造，意味着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和人才支撑能力，意味着产业发展形态和政府治理形态进入数字化时代，也意味着必须适应数字化要求，加快运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化，增强创新驱动发展能力。要推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育和空间优化，加快建成美丽中国。要推进城乡、产城、区域和多规融合，推动城镇现代化取得重大突破。要推进经济、城镇、社会等加快转型升级。要着力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着力补齐短板，把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关键抓手。城镇化水平越高越要重视乡村发展，乡村永远是城镇现代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着力补齐乡村落后这一短板，加快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和收入差别，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人民共同富裕、社会公平正义，让美丽乡村成为现代化重要标志。要优化乡村发展布局，推动大中小城市与镇乡村布局更加科学合理、资源管理利用效率更高。要改善乡村环境，加快形成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释放乡村发展活力，全面推动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为推进中国式城镇现代化夯实基础。



7. 文化与生活

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应贯穿于城市治理与建设的全过程。高品质生活城市着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以推动服务性消费为关键抓手，创建服务水平更优质、业态布局更丰富、消费体验更满意的生活场景。而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激活城市发展动能，文化是重要支点。本维度综合考察城市建设成果与居民生活品质，共涵盖“居民收入”、“博物馆”、“电影院”、“公共藏书”、“消费活力”五个变量。

总体来看，城市建设与经济发展具有良性互促作用，维度排名前十五位均为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城市。维度排名第一的上海在“电影院”、“消费活力”两项变量中位居榜首，北京在“博物馆”、“公共藏书”两项变量中拔得头筹。杭州、广州、苏州、深圳、南京、武汉依次位列第3名至第8名，重庆和无锡并列第9名。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体系。博物馆作为考古研究成果、中华文化典籍的主要传播载体，在推动文化建设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今年在沿用“电影院”

和“公共藏书”变量的基础上，新增“博物馆”变量，更为全面的描述城市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情况和服务水平。西安、重庆、青岛、武汉、哈尔滨、天津在此变量中位居前十，且优于维度表现。天津积极培育文化消费，依托文化单位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与京津冀城市群共同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在“公共藏书”变量中也名列前十。

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高质量发展既需要通过提高居民收入来夯实人民群众的物质基础，也需要依靠发展生活性服务业来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居民收入”和“消费活力”变量从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角度反映城市内需潜力和经济循环情况。香港、澳门、上海、北京、苏州在“居民收入”变量位居前五，长三角城市宁波、常州，东南沿海城市厦门、珠海、东莞，在变量排名中均表现亮眼，高于维度排名。“消费活力”变量排名中，南京、青岛、泉州、济南、合肥、福州以优于维度表现的排名位列前15名。其中排在第8名的新增观察城市泉州，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试点城市名单，通过积极推动现代服务业提质扩量，着力打造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聚集区。

访谈

城镇化/城市视角的服务与消费经济思考



李晓江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院长、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发展服务经济、消费经济不仅是后疫情时代恢复经济、提振信心、激发活力的需要，也是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优化经济结构，满足居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社会已经从一个低收入/贫困国家转变成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伴随着这个变化，城市发展的逻辑和人的迁徙的动力发生了变化；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服务的供给模式发生了变化。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使居民就业、生活安家的选择能力增强，城镇化人口流动的动力已从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提高收入转向了获得更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服务，寻找适合安放家庭的高性价比城市。因此，服务经济发达，公共服务质量高而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口，尤其是大学毕业的专业人才。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一方面，社会消费形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消费经历了从解决温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追求品质、品牌的产品消费进程，又从产品消费转向提高生活质量的服务消费，满足精神需求的体验消费的过程。消费的形式和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另一个方面，由于收入阶层分化，社会角色差异和兴趣偏好差异，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个性化。因此，服务与消费经济发展应当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以满足不断增长的新的消费需求；应当为不同收入阶层，不同角色/身份人群和不同偏好个体提供差异化、多样化的供给。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家的经济结构必然会从一产、二产为主转向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第三产业为主。但是居民消费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中占比长期低于30%，仅为发达国家和同等收入国家的一半，居民的消费能力不强，服务经济发展缺乏动力。

在国家层面“十四五”规划提出了经济结构优化的方向，提出了财政、税收制度改革的方向。通过这些制度性改革，摆脱经济恢复和增长对于基本建设投资的依赖，地方财政对于土地收入和房地产业的依赖，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动能转换，从而使居民消费能力不断提高，潜力不断释放。

在地方层面，应当正确认识本地区的发展阶段特征，居民的收入水平，生活成本承受能力和消费能力，细致分析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的消费能力，对产品、服务、体验消费的需求偏好，组织有效的服务与消费供给。

在城镇化领域，应当以公共服务，尤其是优质公共服务的均衡配置，以生活性服务、消费经济的充分发展引导不同需求和消费能力人口向不同层级的城市、县城聚集，形成大中小城市人口结构、经济结构优化；应当重视县城的服务与消费经济发展，促进县（市）域城镇化，提升广大乡村地区生活品质。应当充分鼓励自然与文化遗产资源聚集地区更加积极地发展旅游、休闲（户外）等体验经济，促进欠发达地区特色发展，满足快速增长的体验消费需求。

在城市发展领域，应当积极鼓励服务经济、消费经济的充分发展，尤其要关注消费偏好的分化，从重视大众消费转向关注“分众”消费。城市规划建设要从关注宏大空间形象转向人性化尺度、活力空间建设，营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所和场景。城市管理需更加开放，要包容非正规经济活力，重视城中村、城乡结合部的治理与改善，为中低收入人群和新市民创造包容性就业、创业和生活环境，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



8. 经济影响力

面对深刻复杂变化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经济等任务，我国的经济发展仍处于疫情等冲击后的恢复阶段，“经济影响力”维度借助“知名企业”、“外商投资”、“金融机构存贷款”、“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量描述在这一阶段城市应对诸多风险及挑战，所展现的经济综合实力与影响力。

香港在这一维度拔得头筹，体现了其强劲的经济韧性和抗风险性，同时在“外商投资”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变量以绝对优势保持领先。上海、北京维度排名分列其后，在“知名企业”、“金融机构存贷款”和“地区生产总值”变量中包揽前二。地区生产总值十强城市深圳、杭州、广州、南京、苏州、武汉、成都、重庆均排名靠前，在多个变量中凸显了超大体量城市在经济上充沛的发展动力。

“知名企业”变量选用各城市拥有的2022年中国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来评价城市的招商吸引力和经济影响力。厦门在这一变量位居前列，不仅持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而且运用“财政政策+金融工具”的方式纾解企业流动性困难，帮扶企业更好发展。另外，西部城市乌鲁木齐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上取得积极进展，聚焦发展特色产业，培育引进龙头企业，表现远优于维度排名。

香港、澳门作为国际化的区域节点城市，拥有优异的地缘禀赋和高度开放的经济基础，虽然受到疫情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依然是重要的国际交往和经济往来枢纽。除深圳、广州延续强势引领作用外，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极点城市佛山、东莞也体现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金融机构存贷款”变量中保持前列。粤港澳三地相互协同，借助港澳作为对外交流的窗口作用，对接国际需求，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扩大湾区辐射效应。

中西部地区也在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经济新体制方面持续发力。西安、武汉、南昌、长沙、贵阳、郑州等中西部省会城市作为区域性的金融中心，有序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完善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在“外商投资”变量中均表现较好，反映其对外商投资较强吸引力和发展潜力。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方面，长三角作为全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人均优势十分突出。在这一变量积分前十五位中占据8位，分别是无锡、苏州、上海、南京、常州、宁波、杭州、南通。长三角城市群充分发挥了示范作用，中心城市在保留自有特色优势的同时，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协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实现合作共赢，带动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提升。



9. 成本

近年来，超大特大城市因规模扩张过快、人口密度过大，使得民众在交通、居住等方面的生活成本过高。而大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能力及产业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城市吸引力和成长性相对不足。如何发挥成本较低的城市的优势，承接超大特大城市产业转移和功能疏解，增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协调性，是区域发展下一步亟需解决的难题。在成本这一维度中，我们通过生活侧的“物价指数”、“出行成本”、“住房租金”变量与经营侧的“写字楼租金”、“平均工资”变量，两个侧面来展现城市综合成本情况。

为体现低成本城市的成长空间与发展潜力，本维度采用升序排名的方式，成本越低的城市排名越高，唐山、呼和浩特、保定、石家庄、太原、烟台、肇庆依次位居前七位，兰州、长春、泉州并列第八名。

“物价指数”变量采用2017年至2021年五年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总体变化率，反映城市自身物价水平及居民生活成本的波动情况。兰州、昆明、澳门、香港、重庆依次排名前五位，在这五年时间内的消费价格变动幅度较小，成本控制较为稳定。南宁、济南、苏州、南通、广州依次排名倒数第一至第五位，在大力释放消费潜力的同时，物价指数呈现较大涨幅。

“出行成本”、“住房租金”与“写字楼租金”分别观察了各城市乘坐出租车所需出行成本、生活住房成本、以及商业用房成本。“住房租金”和“写字楼租金”变量中，唐山均位列榜首，反映出在企业经营和人才居住方面存在低成本优势。香港在这两项变量中均排名末位，主要由于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以及租赁需求的改善。

劳动力成本的合理上涨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升级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平均工资”变量借助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衡量城市的用工成本，人口密集城市北京、上海、香港、深圳积分最低，反映出劳动力成本与城市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的正相关性。工资水平即用工成本的提高将进一步释放内需发展潜力，人民群众倾向于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品及服务，新产业新业态也会顺应消费的提质升级而发展壮大，从而带动市场与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为劳动力报酬的持续优化提供保障。此变量排名靠前的保定、石家庄、唐山、肇庆、江门等城市，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中仍然具有劳动力成本优势，能够承接符合自身功能定位、发展方向的中心城市外溢产业，对劳动力人口也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城市群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离不开健全的成本共担和利益共享机制，区域城市间的资源互通、产业共创、环境共治，是优化城镇化产业布局的必经之路。



10. 宜商环境

宜商环境主要观察城市在商业环境及各类制度建设等软性实力方面的水平，宜商环境不仅直接反映当地企业的发展环境，城市的经济活力和发展潜力，同时也是对投资者吸引力、孵化创业企业能力的侧面反映。本维度从“创业活力”、“外贸依存度”、“快递物流”、“收支平衡”、“营商环境”五个变量来观察城市对企业经营发展的外部环境和软环境，前三个变量更多的是反映在城市各类政策鼓励和驱动下创新创业氛围、吸引外资能力、硬件支撑水平等，后两个变量则是更多体现城市管理者对城市软实力的建设和运营能力。

在本维度中，位居前四名的城市是深圳、上海、苏州、杭州。这4个城市呈现一个共性特点就是各单项变量实力均衡位居前列。北京位列第五并且在“创业活力”变量拔得头筹，与其“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定位和发展方向高度一致。多个长三角城市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均在本维度取得了优于总排名的较好表现，这些经济活跃、商业基础完备、经营环境友好的城市对于内外资投资者有足够的吸引力，也是在经济复苏中首先发力的主要支撑力量。首次纳入观察的泉州和南通也取得了优于其总排名的表现，与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匹配。

“创业活力”重点关注城市中非国有上市企业和独角兽企业数量，创新创业是城市发展的重要源动力，良好的创业便利性和创新企业孵化能力是城市发展潜力的综合反映。常州、东莞、珠海等城市在该变量均跻身前列，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城市活力通过创新创业得到迸发。“外贸依存度”变量中，香港继续拔得头筹，体现了其作为亚洲金融中心的实力基础。东莞、珠海、中山、惠州、佛山、江门这些大湾区城市表现较好，外贸对保持经济稳健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

“快递物流”主要观察城市对商业活动的基础条件支撑水平，石家庄在此变量位列第10，优于其维度表现和总排名，作为国家物流枢纽布局中的重要节点城市，表现可圈可点。

经过近些年的重点工作，中国城市的“营商环境”得到了充分的优化和提升，企业经营便利性得到极大改善，在中央到省级政府的主动引导和领先城市的积极示范带动作用下，多数城市的政务流程得到精简和规范，电子政务服务水平得到跃升，在未来这些进步都将转化为吸引企业和投资者的重要发展机遇。总体而言，城市宜商环境的建设是长久之计，在后疫情时代的城市经济复苏和恢复活力、稳健发展的过程中将起到关键的助推作用。

变量说明

一、智力资本

企业R&D经费

该变量采用2021年各城市规上工业企业R&D经费内部支出，以衡量全社会中企业对研发的投入情况。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的统计年鉴和科技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高等教育规模

高等教育在校生是城市未来人力资本的重要储备，该指标选取各城市2021年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在校生的数量作为未来人力资本储备的衡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国家重点实验室

通过拥有各类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数量，衡量各城市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基础设施条件与发展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国家科学技术部发布的相关统计报告，香港及澳门地区数据获取自公共信息。

科技支出

该变量使用各城市2021年科学技术财政支出决算数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各城市政府对科技研发相关领域的投入情况。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局、财政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文化程度

人口文化程度通过计算第七次人口普查中各城市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以及文盲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综合分析评价各城市整体人口文化程度情况。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香港数据来自统计处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及联合国2016年识字率数据。



二、技术与创新

专利授权

该变量用各城市每万人专利授权量来衡量城市的创新发展水平，计算方法为2021年专利授权量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高新技术企业

该变量选取各城市2021年末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衡量城市的科技与产业创新能力。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公报、政府工作报告及省市科技部门公开数据。

新能源汽车普及率

该变量通过计算城市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保有量的比例及每千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衡量城市的新能源汽车普及程度。内地城市数据采用公安部及大搜车智云平台的2022年末数据，香港数据来自香港运输署，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移动互联

该变量选取各城市2021年移动电话用户数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的比值和赛迪顾问编制的《2022中国数字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中的城市新型信息基础排名两个子指标，综合衡量城市移动互联网和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及应用程度。移动电话用户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

数字城市

该变量包括中央党校电子政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1省级政府和重点城市一体化政务服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排名和赛迪顾问编制的《2022中国数字城市竞争力研究报告》中的数字城市排名两个子指标，综合衡量各城市在数字治理、数字经济方面的发展水平。



三、区域重要城市

星级酒店

该变量选取各城市的星级酒店数量，以衡量各地星级酒店的供应能力与发展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文化和旅游部2021年星级酒店统计公报及各城市统计年鉴、统计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飞机起降航班

飞机起降航班数量反映各城市的航空客货运输情况。基于城市各主要机场空中交通工具的起降航班数进行排名，包括民用国际及国内航班、货运飞机航班及非营收航班，但不包括军用飞机。内地城市数据来自《2021年全国民用运输机场生产统计公报》，尚无机场的城市积1分。香港数据来自香港民航处，澳门数据来自澳门国际机场统计资料。

客运总量

客运总量包括铁路、民航、公路、水运等渠道的旅客运输量，反映各城市2021年的客运业务规模与承载能力，间接体现城市

在所处区域中的枢纽功能。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货运总量

货运总量包括铁路、民航、公路、水运等渠道的货物运输总量，反映各城市2021年的货运业务规模与承载能力，间接体现城市在所处区域中的枢纽功能。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会展经济

该变量为会展经济发展指数，数据采用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发布的《2021年度中国展览数据统计报告》中披露的城市展览业发展综合指数，衡量各城市会展业的综合发展水平。香港、澳门排名是根据展览数量、展览面积、展馆数量等多项指标进行对标和计算，数据来自香港贸发局披露的香港会展服务业概况、香港展览会议业协会资料、澳门统计年鉴等。



四、城市韧性

医疗资源

该变量用2021年各城市执业医师总数、医院床位总数、每万人医疗机构执业医师人员数、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以及各城市拥有三甲医院总数作为子指标，综合衡量各城市整体医师资源、医疗设施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卫生健康

该变量使用各城市2021年卫生健康财政支出决算数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各城市人均卫生健康相关财政投入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和财政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养老保险

该变量为养老保险覆盖率即城市中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参保人口包括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

数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该变量用来衡量2021年各城市的基本养老保险发展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澳门数据来自公开信息。

公共安全

该变量使用各城市2021年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决算数除以年末常住人口数量，衡量各城市人均公共安全相关财政投入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和财政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

该变量包括2021年人均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财政支出决算数和亿元GDP生产安全事故死亡率两个子指标，衡量各城市在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方面的财政投入水平及生产安全防治程度。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公报、应急管理局以及城市财政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五、交通和城市规划

道路资源

该变量以各城市的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汽车保有量作为子指标，用以衡量各城市道路基础资源和承载能力。内地城市数据采用《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和公安部及大搜车智云平台2021年末数据，香港数据来自运输署，澳门数据来自交通事务局。

公交出行

该变量以各城市的2021年人均公共汽（电）车客运总量，衡量各城市的公交出行情况。内地城市数据来自交通运输部和各城市统计年鉴，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交通事务局。

轨道交通

该变量采用轨道交通运营线路长度除以城市建成区面积，反映各城市的轨道交通发展现状。内地城市数据来自《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香港数据来自港铁集团和规划署，澳门数据来自地图绘制暨地籍局。

交通效率

该变量采用百度地图《2022年度中国城市交通报告》中的交通拥堵指数排名和高德地图《2022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中的城市交通健康指数排名作为子指标，用以综合衡量各城市的道路拥堵情况和交通通行效率。香港、澳门参照内地评价体系依照同口径数据计算。

绿化

该变量以《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衡量各城市建成区的绿化水平。香港数据来自规划署，澳门数据来自环境保护局。



六、可持续发展

水资源

该变量采用各城市2021年水资源总量以衡量城市水资源总体情况，间接反映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内地城市数据来自于各城市水利部门水资源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水务署，澳门数据来自海事及水务局。

城市环保

该变量包括垃圾焚烧量占无害化处理垃圾总量的比例和污水处理率两个子指标，以衡量城市在环保方面的运营效率。内地城市数据来自于《2021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的垃圾分类处理数据，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和渠务署，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和环境保护局。

空气质量

该变量包括空气质量和空气质量优化两个子指标。其中空气质量数据来自于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全国城市空气质量报告》2021年9月至2022年8月的月度报告。空气质量优化数据通过计算综合指数排名的提升幅度反映各城市的空气质量改善情况。计算方法是将各城市在《报告》中2021年

9月至2022年8月、2020年9月至2021年8月的综合指数的排名相减。香港、澳门排名采用《粤港澳珠三角区域空气监测网络的监测结果报告》进行人工计算得出。

人口流动

该变量取值为2021年各城市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值，以及2021年与2020年户籍人口的比值，综合衡量各城市的人口流入或流出情况。内地城市数据来自第七次人口普查公报、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绿色低碳

该变量包括2021年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与全社会用电量的比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21）》中的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状况评估结果两个子指标，综合衡量城市能源消耗情况及产业结构的绿色低碳转型趋势。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七、文化与生活

居民收入

该变量采用202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衡量各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博物馆

该变量取值为各城市2021年末博物馆总数，以衡量城市历史文化产业的发展规模与社会服务能力。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电影院

该变量采用截至2023年2月各城市的电影院总数，衡量各城市的影视文化发展规模与活力。内地城市数据来自猫眼电影网站上公布的电影院数量信息，香港、澳门数据来自公开统计数据。

公共藏书

该变量包括2021年公共图书馆藏书总量和人均拥有公共图书馆藏书量两个子指标，综合衡量各城市的公共文化资源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省统计年鉴、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消费活力

该变量包括各城市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两个子指标，以综合衡量各城市的消费水平与消费潜力。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八、经济影响力

知名企业

该变量用各城市的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排名来衡量城市的总部经济发展程度，进而评价其经济影响力。企业总部数量取自《财富》中文网公布的2022年中国500强排行榜。

外商投资

该变量采用2021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各城市对外商投资的吸引能力和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金融机构存贷款

该变量包括2021年末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和存贷比三个子指标，用以综合衡量各城市的金融机构存贷款情况，进而反映其金融影响力。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统计署，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地区生产总值

该变量采用2021年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各城市的整体经济规模。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统计署，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该变量采用2021年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衡量各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统计署，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九、成本

物价指数

该变量采用2017年至2021年五年内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总体变化率，衡量各城市的整体物价以及居民生活成本的变化情况，按照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统计署，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出行成本

该变量采用2023年2月各城市巡游出租车的价格标准，以及各城市的平均出行半径数据，计算乘坐出租车出行的每公里平均单价，进而衡量各城市的出行成本，按照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发展和改革委、滴滴出行大数据及百度地图，香港、澳门数据来自公开信息和同口径数据计算。

住房租金

该变量采用2022年各城市市区每平方米的住房平均租金以衡量住房成本情况，按照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香港、澳门数据来自公开信息。

写字楼租金

该变量采用2022年各城市市区每平方米的办公写字楼平均租金以衡量商业用房成本情况，按照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中国房地产业协会，香港、澳门数据来自公开信息。

平均工资

该变量采用2021年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衡量各城市的用工成本，按照由低到高进行排序。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十、宜商环境

创业活力

该变量包括2020至2022年各城市沪深A股上市的非国有企业增量和在美股或港股上市的非国有企业增量，以及截至2023年2月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三个子指标。上市公司数据来自万得（Wind）数据库，独角兽企业数量来自IT桔子数据库。

外贸依存度

该变量计算各城市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用于衡量城市对外贸易活动的规模与发展水平，进而反映城市的宜商程度。内地城市数据来自统计年鉴及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快递物流

该变量为包括2021年快递业务量和人均快递业务量两个子指标，综合衡量城市的物流规模与物流效率。内地城市数据来自国家邮政局及统计公报，香港数据来自政府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澳门邮政年报。

收支平衡

该变量以各城市2021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作为财政收支平衡的衡量标准。内地城市数据来自统计局、财政局，香港数据来自香港统计处，澳门数据来自统计暨普查局。

营商环境

该变量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19:超大、特大城市:健康基准与理想标杆》中2021年中国城市营商软环境竞争力排名和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报告》中各城市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得分作为子指标，综合衡量城市营商环境水平，未发布指数的城市采用同口径数据计算。

鸣谢

普华永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以下人员，为本报告的出版做出了贡献：

专家委员会

俞建拖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
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

梁伟坚

普华永道全球客户及市场执行委员会委员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主管合伙人

李丹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首席合伙人
普华永道全球审计领导团队成员
普华永道亚太及中国审计主管合伙人

周星

普华永道中国北部市场兼北京主管合伙人

黄佳

普华永道中国中部市场兼上海主管合伙人

张立钧

普华永道中国南部市场兼深圳主管合伙人

陈静

普华永道中国国企业务主管合伙人

金军

普华永道中国交易咨询合伙人

项目研究团队

张旸（普华永道）

刘耿华东（普华永道）

向子期（普华永道）

李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李奇文（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闫晓旭（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项目管理团队

冀菲（普华永道）

杨婧（普华永道）

胡自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王雪（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编辑团队

蓝澜（普华永道）

梁杉（普华永道）

吴婧怡（普华永道）

设计团队

何霖（普华永道）

黄璐（普华永道）

进一步联络信息

普华永道多年来持续关注中国城市的发展机遇和城镇化进程，在城市及区域发展战略、综合评估、营商环境提升、韧性城市建设、城市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形成了科学严谨的体系化方法论，以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希冀可以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提供具有实践基础和前瞻性的深度分析，为城市提升发展质量和提高治理水平提供助力。

如您希望了解我们在城市发展研究方法或上述领域的实践经验，敬请联络我们。

城市发展研究团队

金军

普华永道中国交易咨询合伙人
+86 (10) 6533 2977
jun.jin@cn.pwc.com

蓝澜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推广及传讯部高级经理
+86 (10) 6533 8759
lan.l.lan@cn.pwc.com

张旸

普华永道中国交易咨询业务总监
+86 (10) 6533 7569
carrie.zy.zhang@cn.pwc.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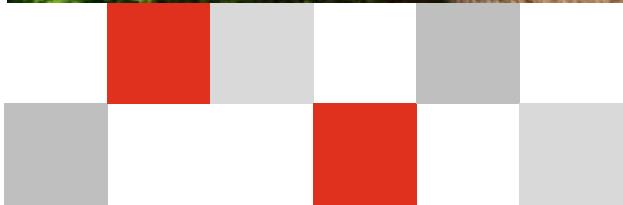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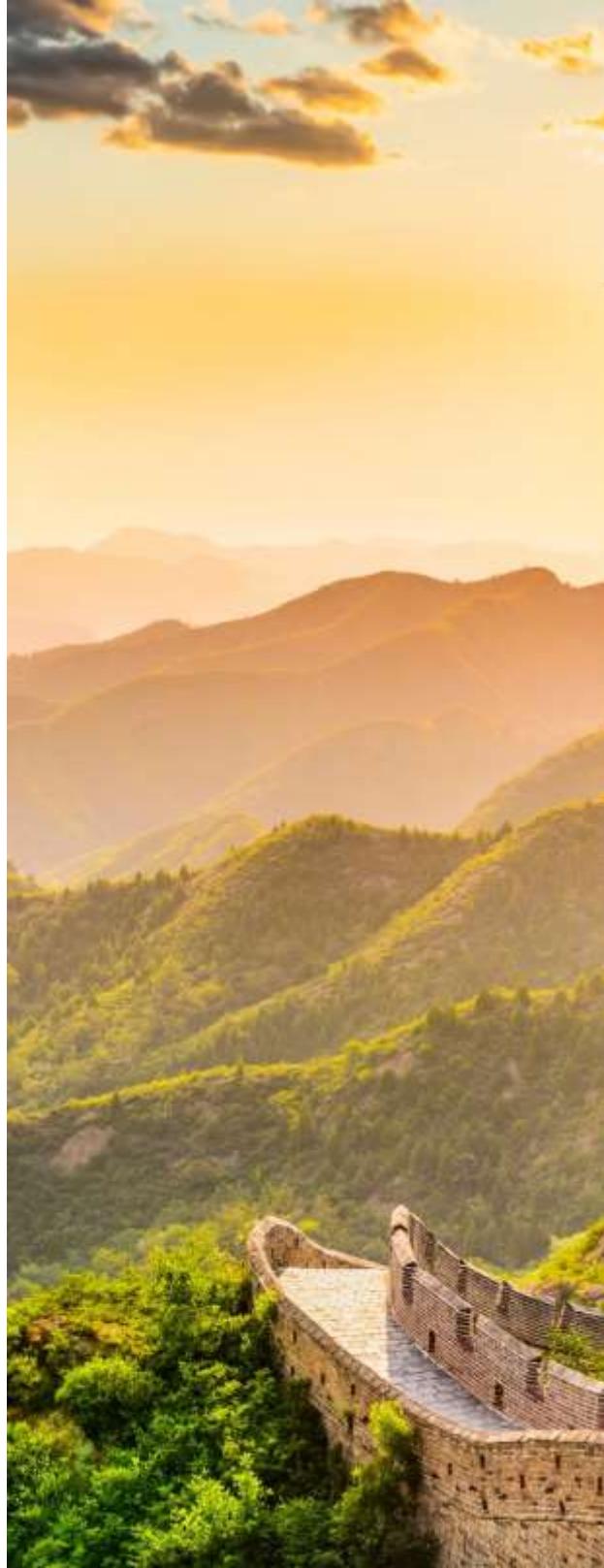
媒体联系人

梁丽
普华永道中国市场推广及传讯部高级经理
+86 (10) 6533 8708
christy.liang@cn.pwc.com

调研合作咨询

冀菲

普华永道中国政府事务总监
+86 (10) 6533 7013
faye.ji@cn.pwc.com



www.pwccn.com

本文仅为提供一般性信息之目的，不应用于替代专业咨询者提供的咨询意见。

© 2023 普华永道。版权所有。普华永道系指普华永道网络及 / 或普华永道网络中各自独立的成员机构。

详情请进入 www.pwc.com/structure。